

1401431

勵耘學刊

(文学卷)

2010年第1辑
(总第11辑)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主办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1401431

學苑出版社

184104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励耘学刊. 第11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077-3587-1

I. ①励… II. ①北… III. ①文学研究-中国-丛刊
②汉语-语言学-丛刊 IV. ①I206-55②H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3502 号

群 I 类 0105
(群 II 类总)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文 学 院 主 办

出 版 人: 孟 白

责任编辑: 刘 丰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 book001. com](http://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 bta. net. cn](mailto:xueyuan@public.bta.net.cn)

邮购电话: 010-67674055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 (邮购)

印 刷 厂: 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印 张: 38.25 印张 (文学卷、语言卷两卷合订)

字 数: 616 千字 (文学卷、语言卷两卷合订)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16.00 元 (文学卷、语言卷两卷合订本)

《励耘学刊》(文学卷) 编委会

顾 问 童庆炳

主 编 郭英德

副主编 李春青 李 山 杨联芬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方 宁 乐黛云 刘 利 刘晓南

孙银新 李 山 李宇明 李运富

李国英 李春青 李 强 杨 义

杨联芬 吴福祥 张 健 张涌泉

陈思和 项 楚 郭英德 曹卫东

盛 宁 蒋原伦 蒋冀骋 温儒敏

冯胜利 (美国) 大西克也 (日本)

竺家宁 (中国台湾) 黄坤尧 (中国香港)

李欧梵 (中国香港)

编 务 许庆江

目 录

新视域

思想家的“孤独”？

——关于陈映真的文学和思想与战后东亚诸问题的

内在关联 黎湘萍 (1)

艺术与生命

——饶宗颐论书画艺术和音乐 施议对 (22)

F.R. 利维斯与英美新批评 张瑞卿 (48)

文学史专题

“只愿文章中试官”

——论明代通俗小说中与官相关的情节模式 叶楚炎 (66)

蒲松龄对志怪狐狸精的扬弃 刘瑞明 (77)

阿 Q 革命身份试论 刘涵之 (90)

30 年来中国的社会与文学

——对 1949—1976 年中国文学的一个考察 杨 扬 (104)

莫言小说中的一些特别事象与景观 张 灵 (133)

论司各特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 万信琼 (151)

《诗·唐风·蟋蟀》中的“蟋蟀”

意象及其文化内涵探幽 郝建杰 邵炳军 (164)

礼教图式与死亡信仰

——东汉武氏祠历史故事画像之文化叙事新论 郑文惠 (177)

文献考辨

- 招魂曲：《楚辞》注释的抒情向度 廖栋樑 (209)

青年园地

- 章句学与两汉儒学风向 唐 元 (241)

- 周作人隐逸心态再思考 许 江 (261)

颂歌时代的颂歌体

- 《人民日报》(1949—1966) 诗歌研究 许姗姗 (272)

文史名家

- “东北大野”诗人穆木天 穆立立 (286)

- 文学批评家李长之 于天池 李 书 (292)

品书录

跨文化、跨学科的开拓性的文学研究

- 10 卷本《王向远著作集》简评 谭五昌 (298)

思想家的“孤独”？

——关于陈映真的文学和思想与战后东亚

诸问题的内在关联

◇ 黎湘萍^①

摘要：1990年代以后，台湾本土化思潮勃兴，使陈映真带有批判性格的文化、社会、思想评论迅速被边缘化，与七八十年代的影响形成鲜明对比，但他60年代以来的文学写作（特别是小说）仍魅力不减。关于陈映真的解读，分别在“诗”与“思”两方面出现了裂痕，两岸知识界对陈映真的解读，均有类似的现象，但因历史脉络的差异，对于陈映真的欣赏、接受、评价，在取舍上又有所不同。本文意在分析这种充满了困惑和分歧的解读现象，认为只有将陈映真放在东亚近代史的脉络中去定位，将陈映真先生的文学和思想放在更广阔背景下进行整理和总结，思考陈映真50年代以后的文学写作和文化、思想、社会评论与战后东亚社会、历史诸问题的关联，方能更为完整地呈现陈映真的思想和文学的面貌。这与仅将陈映真放在台湾的统独论述中去为他“着色”，或者仅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运用去判断他是否教条，是不同的思考角度。

关键词：陈映真；文学；思想；战后台湾；东亚

他们用梦支持着生活，追求着早已从这世界上失落或早已被人类谋杀、酷刑、囚禁和问吊的理想。也许他们都聪明过人，但他们都那样独来独往，像打破玻璃杯一样轻易地毁掉生命……

——陈映真：《哦！苏珊娜》（1966）

陈映真平日与人交往，随和而亲切，不止是合群，而且很有影响力。

^① 黎湘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然而，大凡接触过他的人，似乎都能或深或浅地感觉到他的“孤独”感。有的人不管在什么年代，不管政治、意识形态和时尚的潮流怎么变化无常，自己永远都是站在流行的“政治正确”一边，相比之下，陈映真就不免有点“不合时宜”了，他的想法经常与时潮格格不入，看来真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无论如何都要坚持抱朴守真的人，必然无法回避其孤独的命运。对于“孤独”，陈映真确实也有其特别的体会。在散文《汹涌的孤独——敬悼姚一苇先生》中，他提到姚一苇先生这样战后“怀璧东渡”的一代理想主义者，在50年代以还的冷战高压环境中，不敢公开谈论其社会理想，却在看到了青年陈映真小说作品中那无以言明的“内心和思想上沉悒的绝望和某种苦痛”之后，“平静地谈到了他少年遍读和细读鲁迅的历程”，“在那即使亲若师生之间鲁迅依然是严峻的政治禁忌的时代，我也第一次向他透露了我自己所受到的鲁迅深远的影响”。姚一苇先生以自己所理解的鲁迅为例，谈到鲁迅的晚年“不能不搁置创作走向实践的时代的宿命”，但他却鼓励陈映真写小说，而委婉劝他远离险恶的政治，说“即使把作品当成武器，创作也是最有力、影响最长久的武器”。^①陈映真在姚一苇不避讳的鼓励之中，“听懂了先生不曾明说的语言，而先生也了解了我不曾道出的思想和身处的困境”。他感受到姚先生关爱的温暖，更体察到姚先生与自己类似的孤独感。正是这种“孤独感”，使陈映真比同时代人更敏感于战后台湾的重重问题所在，意识到这个时代在冷战格局中形成的新的社会矛盾，意识到台湾与朝鲜这个旧的日本殖民地社会一样，在旧有的历史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的前提下，又被编入新的国际化冷战和民族分裂之中，而台湾所有的精神病患，都源于这种新的“后殖民地·冷战·民族分裂”结构之中。这是怀抱着社会主义理想并意欲以此理想来超克台湾社会的“后殖民地·冷战·民族分裂”等多重矛盾从而重建一个新的理想社会的陈映真，不见容于战后的台湾社会及其主流的意识形态的主要原因，也正是他终其一生都怀抱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而如鲁迅般彷徨于“无地”之间的原因。

1945年8月光复以来的台湾，在思想探索、社会批评、政治实践、文化·文学活动诸方面都卓然独立、自成一家的大师级人物中，陈映真无疑是最具有理想性、实践性和争议性的。但如果把陈映真仅放在台湾

^① 陈映真：《汹涌的孤独——敬悼姚一苇先生》，原载1997年6月22日《联合报》联合副刊。

的范围内去理解，则很容易受限于台湾内部的复杂的政治光谱的影响，使陈映真仅被定位为“左翼”的“统派”，甚至把他 90 年代以后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批评，贴上“狭隘民族主义”的标签而加以轻视，而忽视了他的文学与思想的更为深广的价值。在我看来，只有把陈映真放在战后东亚地区的历史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上，才能理解“这一个”陈映真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在东亚地区、在第三世界对几百年来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反思和批判的思想史脉络里的真实意义。

我过去在《台湾的忧郁》中论陈映真时，曾说他的身上有两个人的影子，一个是他所理解的试图以“社会革命”来完成以色列人的解放的犹大，一个是以“博爱”为救世真理的耶稣。这两个人在他的身上分裂为两种互相联系又有矛盾的人格，表现为实践其理想的两种不同的方式。^①现在，可以比较准确地说，陈映真的身上，有两个人的影子，一个是内在于他的精神、血肉的充满了感性力量的耶稣，这个耶稣使他可以借艺术作品进入人的灵魂深处，挖掘人内心的神性和罪性，写出了人最深刻的不安和慈悲；另外一个则是在世界近代思想史上据有知识和理性的高度的马克思，借助马克思，他试图解释并解决人在历史和现实社会中的困境或人性桎梏。如果说，耶稣构成了“想象的陈映真”之小说的血肉和感性，那么马克思则成为“现实的陈永善”之知识和理性，^②这两者结合，难分彼此。

我在重读陈映真的时候，一直在反思阅读陈映真时有些人经常提出的问题：早期的陈映真比晚期的陈映真更有魅力；艺术的陈映真比思想的陈映真更让人觉得亲近。为什么“作家陈映真”受到欢迎，而“思想家陈映真”却遭到冷遇？难道只是因为“作家陈映真”的小说作品的充沛的感性经验，与读者更容易引起共鸣？而“思想家陈映真”的那些理性思考，却是“过时”的“教条”？“作家陈映真”在他的作品里所表现的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与“思想家陈映真”对他所生活的时代、社会诸问题所思考、反省和批判的深度和广度，是和谐一致的还是相互矛盾的？陈映真的文学与思想，与战后东亚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诸问题有何内在关联？

① 黎湘萍：《台湾的忧郁》，第二章，第 77—79 页，台北人间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版。

② 陈映真本名陈永善，映真是他往生的孪生同胞哥哥的名字。我在《“出走”的“使徒”——陈映真与基督教》一文中曾分析过陈永善与陈映真通过基督教而形成的“灵”的联系，拙文参见香港《文学世纪》2004 年第 4 期（总第 37 期）。

“统独”在陈映真所思考的问题链中，又处在什么位置？

作家陈映真与思想家陈永善：自始至终是一对无法分开的双胞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民间文化界，有《自由中国》（1949年创刊）、《文星》（1957年创刊）在争取言论、思想自由方面撑起自由主义的大旗，《文学杂志》（1956年创刊）、《笔汇》（1959年出革新版）、《现代文学》（1960年创刊）、《剧场》（1965年创刊）等则在现代（主义）文学的倡导方面独辟蹊径，这个时候的陈映真只是一个从莺歌镇来到台北淡江英专读书的浪漫、激情而似乎有些忧郁的文学青年，算不上场面上响当当的人物。然而，他也已经以其作品和论述，表现出与同时代人“同情不同调”的特异性。

第一个《面摊》（1959）摆在尉天骢主编的革新版《笔汇》第1卷第9期上时，陈映真将台北街头辛苦辗转的一家三口，置于“法律”与“人情”或“国家”与“人民”相冲突的场域，而刻意于描绘常被人所忽略的小人物们的细腻的内心世界，这是包裹在坚硬的国家、社会外壳中的最柔软的“仁”，是小人物家庭于最艰难的情境中仍能勉力扶持、勇敢生存下去的“爱”。后来在陈映真笔下常见的疲倦而温柔的人物在《面摊》中首次出现，他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腼腆的警官。来自国家执法人员的善意和温暖，哪怕只是一个微笑，一点微弱的帮助，都能让从乡下到台北来的一家三口感恩难忘。这篇小说令人想到赖和的名作《一杆秤仔》（1925年写，1926年发表），同样的场景，不一样的结局。如果说，赖和是以写实主义的方法来写“强权横行”的土地上，警察以“法律”的名义逼迫小民，使之走投无路而不得不起来反抗的悲剧，那么，陈映真的《面摊》则显然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陈映真之“怀璧”，早于此篇见其端倪。这是陈映真高度理想化的歌颂人性善的短篇，他早已意识到警察作为国家权力和法律的执行者，对于细民百姓的普通生活所具有的高度影响力。因此，我们也不妨把这篇作品解读为在经历了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之后，年轻陈映真在鲁迅的影响之下，对理想化的“国家与人民”关系的象征性描写。

但这种“理想化”的描写似乎并不能维持很久，1960年发表的《乡村的教师》很快就进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的非理想化状况的深度探索。《乡村的教师》的主人公吴锦翔，一生横跨两个时代，即日据时代和战后台湾光复的时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本拉去当“志愿兵”，在南洋丛林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梦魇后侥幸活着返乡的吴锦翔，因

为吃过人，精神深处早已伤痕累累，国家暴力以战争的形式强加于像他那样的无数人民头上。然而台湾光复带来的希望，使他的理想复活，以为“设若战争所换取的仅是这个改革的自由和机会”，那么，“或许对人类也不失是一种进步的罢”。^{[1] (P29)} 但最后，他看到的却是台湾光复后陷入内战恐惧之中的国家政权彻底摧毁了他的改革理想。陈映真是第一个在《乡村的教师》中表现太平洋战争时期台籍日本兵的身体和精神的境遇、表现台湾光复后充满了改革中国“愚而不安”社会的理想的一代人在面临二二八事变之后因国家政权的保守化而理想破灭而精神苦闷的作家。尽管在小说中，关于台湾战前和战后的社会历史的描写很隐晦，但陈映真还是以象征性的笔法，塑造了一个没有死于战争，却自我毁灭于战后的绝望的吴锦翔，他的颓废、堕落表面上看似只是因为不断受到在南洋丛林中吃过人肉的罪恶感的困扰，实际上，陈映真早已暗示了一个战后两岸民族分断、在台湾的新的保守时代的到来，而这个时代的到来，浇灭了吴锦翔这样的台湾青年的改革社会的理想，“冥冥里，他忽然觉得改革这么一个年老、懒惰却又倨傲的中国的无比的困难来。他想象着有一天中国人都挺着腰身，匆匆忙忙地建设自己的情形，竟觉得滑稽到忍不住要冒渎地笑出声音来了”。^{[2] (P31)} 在《乡村的教师》中，陈映真触及到了战后东亚社会面临的新的复杂境况：原来的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走向崩溃之后，其黑暗历史（包括日本本国逐步帝国主义化、军国主义化、其殖民扩张给周边国家带来的灾难）还没有受到彻底的清算，很快就与曾被它殖民统治的韩国、台湾一起，编入新的冷战国际体系，置入美国的势力范围；朝鲜半岛一分为二，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中华民族在国际势力的干涉下再度分离。吴锦翔的绝望与堕落，终至于自杀，与其说是纯粹的“个人”行为，毋宁说是一桩历史事件，与其说是吴锦翔对于人的内在的罪性的忏悔（对战争期间吃过人的梦魇的痛悔），毋宁说是对于台湾和中国的近代历史重负的承担：吴锦翔是背着近代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国台湾的十字架走向死亡的。

从小受到基督教熏陶的陈映真，从一开始就非常刻意于拷问人性深处的脆弱的暗部，而对这暗部之不安的察觉，恰又源于同样在人性深处的纯洁的神性之光。他极其敏感于人的内在的道德律（人性中的神性之光）究竟如何去面对人因脆弱而犯下的罪行。有着燃烧的私欲和肉体之爱，是否是人的罪？历史之罪与现实之罚，这是陈映真小说从早期一直延续到晚期的重要主题。在《我的弟弟康雄》中，这个问题首开

端倪，是陈映真探索人性内部的历史压迫、现实压迫与道德压迫的开端。康雄的纯洁与教会的教条无关，人与仪礼、律法相比孰大？这样的人有没有资格去建立或追求一个纯洁的地上的天国？康雄因悟罪而死有没有救赎的意义？康雄的姐姐之被迫抛弃理想与现实妥协、换取俗世的幸福，所导致的道德难题，又当如何去面对和解释？陈映真用诗一般感性雅洁而又繁复的语言去思索质疑这些复杂问题，预示了他日后创作中耽于思想的方向。从《面摊》到《我的弟弟康雄》，我们看到他的小说把探索的领域，从“人”的现实层面扩大到对于“人”的精神深处的“罪性”的追问去了。《我的弟弟康雄》（1960）、《乡村的教师》（1960）、《故乡》（1960）、《死者》（1960）、《加略人犹大的故事》（1961）、《苹果树》（1961）、《文书》（1963）、《哦！苏珊娜》（1966）、《第一件差事》（1967）、《六月里的玫瑰花》（1967）、《贺大哥》（1978）等，无不涉及人的“罪性”的问题，但陈映真对人的“罪性”的呈现和反省，并不是抽象的，或仅仅是为了诠释基督教的信仰和概念，相反，陈映真是把他的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这是50年代以后的特殊的历史—政治环境的艺术化）去表现这种难以言传的内心深处的痛苦。陈映真设置的“历史场景”，有的是近在身边的当下生活（《我的弟弟康雄》），有的是劫后余生的战争创伤（《乡村的教师》、《六月里的玫瑰花》），有的则是撕裂心灵的现代史（《文书》），有的则虚拟了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场景（《加略人犹大的故事》）。在这些历史环境中生活的人们，都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生活，因而也无法摆脱这些关系带给他们的意识上的影响。陈映真对导致人的精神深刻不安的“罪性”的探索，也即是对人所生活于其中的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反省和批判。

因此，陈映真的小说在非常丰富细腻的感性世界之外，还提供了对于潜藏在人的精神生活内部的复杂的“罪性”的深刻挖掘和反省，这是陈映真早期小说中最富于思想力的部分，也是陈映真区别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的重要特征。到了晚年，陈映真借助关于人的“罪性”与人所建立的“体制”之间的关系的思考，来重新审视社会主义的理想与实践之间出现的悲剧（典型如中国大陆“文革”时期的状况），这种从早年延续到晚年，从虚构性的小说写作延伸至文化·社会批评领域的思考，我在下文还会涉及。

现在回过头来看，60年代的青年一代的小说中，最耀眼的还是白先勇和陈映真。他们也是那个政治上高度压抑的年代中最富文学激情、最

具小说美感，也最能激发出内在的“反抗性”的作家，只是他们对于那个压抑的年代的“反抗”，采用了不同的方式。白先勇的“反抗”方式，是婉讽，他以春秋笔法写小说，融合古典叙事与现代心理刻画的方法，将激情深藏于冷静的观察和表现之中，肉体、情欲和爱情的交互纠缠，被置于历史的沧桑变化之中加以描写，白先勇以个人的经验呈现、颠覆并改写了大的历史，瓦解了传统的伦理，再造了新的伦理，开拓了人性认识的深度。陈映真的短篇小说，即使是独白性很强的作品，如《我的弟弟康雄》，也有非常复杂的多声部潜在的对话，这篇小说语言的美感胜于画面感或镜头感；他同样善于含蓄而细致地描写那些饱满、温柔的情欲、爱和肉体的感觉，譬如《哦！苏珊娜》、《六月的玫瑰花》和《贺大哥》等作品，但这些描写却是他的人物在自我意识觉醒之后，在现实找不到出路时的庇护所，是人物的自我救赎之道。“革命”是被暗示的一种出路，“死亡”则是“革命”必然失败和流产的结局。如果说白先勇擅长于在小说艺术中“抒写”人在历史中的沧桑感，那么，陈映真更倾向于借助小说来“思考”在战后闷局中进行社会革命和心灵革命的可能性，这也是他很早就不满于台湾现代主义的模仿、软弱和逃避，进而批评台湾现代主义的“亚流性”、“从属性”的原因。

陈映真在1968年因从事触犯禁忌的政治活动而入狱，这实际上即是他不满于仅仅从文字的虚构去表现这个时代的精神闷局而寻求现实的出路的必然结果。这种选择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无悔于这一选择，虽然他对受到牵累的亲友深感歉疚。八年牢狱之灾，是陈映真从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的转折点。出狱后的一系列文学批评和创作，包括他以许南村笔名写的自我解剖式的评论，他的台湾文学评论和一系列涉及当代台湾社会、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评论，他参与编辑的《夏潮》杂志对日据时期台湾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重新出土和诠释，他加入的“乡土文学”论战，他创作的反省晚期资本主义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全球化与跨国公司体制下的人性异化状态的“华盛顿大楼”系列，他再现与反省台湾在后殖民·冷战·民族分裂时期的“白色恐怖”的民众史和心灵史的小说，特别是1985年11月主编的《人间》摄影报道文学杂志，在“解严”之前的台湾，无疑代表了民间最有预见性、最能感动人心、最有批判力量的论述。这个时期的陈映真，成为台湾文化界、思想界独特的风景。我们现在翻阅《人间》杂志，仍能看到，他很早就揭露了台湾社会在现

代化的过程中所留下的各种并发症和后遗症，而这些恰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的世界性的问题，包括弱势族群（特别是原住民和底层民众）、环境污染、历史创伤及其治疗（其实就是所谓“转型正义”问题）、解除报禁、开放两岸民众交流、打破冷战·民族分裂造成的日益保守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封闭状态等问题。这些在80年代中期开始在《人间》杂志上加以报道和讨论的问题，事实上成为台湾党外民主化运动，乃至90年代以后台湾各种议题的先声。

仔细阅读这个时期陈映真的文学创作与文化·社会批评与论述，我们能强烈感受到，他仍在延续50年代以来试图探寻形成台湾社会的日益保守化的思想闷局的根本原因。在不少精英都很享受后殖民地·冷战·民族分裂状态带来的饱足、自满、傲慢和冷漠时，陈映真却踽踽独行于异端思想的道路上，以“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爱”的精神，探索在政治保守化、经济市场化、生活物质化的时代，实现民众救赎的可能性。在《人间》杂志的创刊词中，他写道：

我们抵死不肯相信：

有能力创造当前台湾这样一个丰厚物质生活的中国人，
他们的精神面貌一定要平庸、低俗。我们也抵死不肯相信：

今天在台湾的中国人，心灵已经堆满了永不饱足的物质欲望，
甚至使我们的关心、希望和爱，再也没有立足的余地。不，
我们不信！因此，我们盼望透过“人间”，使彼此陌生的人
重新热络起来；使彼此冷陌的社会，重新互相关怀；使相互
生疏的人，重新建立对彼此生活与情感的理解；使尘封的心，
能够重新去相信、希望、爱和感动，共同为了重新建造更适
合人所居住的世界，为了再造一个新的、优美的、崇高的精
神文明，和睦团结，热情地生活。^①

对陈映真而言，文学与思想密不可分，文学是某种思想之表象，文学也是处于历史、社会和现实生活的复杂关系与运动之中的人寻求解放的某种实践方式。

① 陈映真主编《人间》创刊号，1985年11月。

90年代以后的“孤独”？

台湾解严之后，迎来了90年代以来各种思想、观点、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的局面。表面上看，陈映真从五六十年代以来所深切感受的思想闷局似乎已被打破，两岸的民间交流从1987年以后，也成为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冷战”的格局已化为乌有。恰恰相反，两岸交流的结果，是在发现了对方的差异性之后，反而越发刺激了各自的“主体性”的扩张与区隔。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两岸的人民在隔离了近四十年之后，彼此成了“陌生人”？彼此成为对方的“他者”？对陈映真而言，这不是仅仅用“复杂的情绪化”就可以解释的问题。

事实上，在60年代至70年代创作的小说中，他就以各种文学形象来表现过这种复杂纠葛的“情绪”和“意识”。其中，我以为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是1961年7月发表于《笔汇》2卷9期的短篇小说《加略人犹大的故事》。这部作品，几乎涉及到战后东亚地区诸问题及其症结，其中包括：一、帝国主义问题；二、殖民地问题（战后东亚国家社会性质的变化及其相互的关系）；三、战争创伤问题（“二战”、“越战”）；四、历史问题（日据时期、50年代白色恐怖）；五、冷战问题；六、跨国公司问题；七、民众史问题；八、民族分裂问题；九、白色恐怖问题；十、思想史问题。

陈映真在小说中初步建构了既能艺术地表现性格复杂的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又足以囊括战后东亚问题乃至世界性问题的思考框架的小说模式。陈映真借用《圣经·新约》中讲述的门徒犹大出卖耶稣的故事，来重新塑造了犹大的形象，赋予了这个故事新的意义。小说开篇就充满诗意地写道：

黎明的蓝色从石砌的窗户中契了进来，自阴暗中画出粗笨的一桌一椅，并且那样匀柔地勾勒出墙角的四支陶甄的轮廓来。地中海的海风揉进这曙光里，吹着纱帐，吹着加略人犹大密黑的发和须。^[3]（P81）

家徒四壁，然而犹大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从未被人提及的恋人希罗底，他们在地中海的海风光色中，享受着彼此的爱情。小说接着通过犹大的恋人希罗底的眼睛和感受，去叙述犹大的茶铜色的瘦削的脸，他的

粗豪和敏感，智慧与倨傲，写出他在耶路撒冷遇见耶稣后精神焕发、生意盎然的神情，“眼睛里重又燃烧起一种逼人的火焰”。这些描写，彻底颠覆了犹太这个“叛徒”的刻板印象。而所有这些心理描写和性格刻画，都不过是为了用希罗底的美貌和温柔来衬托犹太悲剧性的思想与性格，又以犹太的思想与性格，来凸显耶稣的思想与性格，激发人们去重新思考罗马帝国统治时期以色列人的政治与宗教、民族解放与个人自由等问题。在再现“犹太卖主”这个传统的故事时，陈映真没有停留在一般的谴责犹太的行为上，而是经由犹太与耶稣、犹太与奋锐党人、耶稣与以色列底层民众、耶稣与法利赛人、以色列民众与上层阶级等等复杂的关系，去呈现罗马帝国殖民统治下以色列人的命运与选择问题。

小说最吸引人的，仍然是思想的问题。陈映真的犹太有种微妙的狂野与倨傲，“他对复国运动有不亚于他们（指奋锐党人）的热情，但是他那某一型式的世界主义却怎样也不容于奋锐党人那种偏狭的选民思想了”。犹太质问那些奋锐党人说：“罗马人的担子，罗马人的轭一旦除去又如何呢？因你们将代替他们成为全以色列人的担子和轭。”他说着，仿佛愤怒起来：“你们一心想除去那逼迫你们的，为的是想夺回权柄好去逼迫自己的百姓吗？”

“世界主义”者犹太也是一个阶级论者，他理想中的复国运动，是推翻罗马帝国，但解放不是为了让自已再沦为奴隶，他批评那些想夺权的奋锐党人说：“你们既然冒着万险自罗马人手中图谋他们的权柄，那么将来分享这权柄的，除了你们还有谁呢？你们将为以色列人立一个王，设立祭司、法利赛人和文士来统治。然而，这一切对于大部分流落困顿的以色列民又有什么改变呢？”

这样一个犹太，才可能从耶稣那里看到革命和动员群众的希望。小说试图把犹太的“背叛”，写成只是在完成耶稣准备赴死的意愿，而利用耶稣的牺牲来动员信众起义。但群众的翻脸无情和耶稣的牺牲，最后教育了犹太。《加略人犹太的故事》最后借犹太之口，写出了24岁的陈映真的感悟：

他（犹太）忽然明白：没有那爱的王国，任何所企划的正义，都会迅速腐败。他了解他自己的正义的无何有之国在这更广大更和乐的王国之前是何等的愚蠢而渺小，他的眼泪仿佛夏天的骤雨一般流满了他苍白无血的脸。^{[3] (P101)}

罗马帝国作为帝国主义的象征，它在犹太地区的殖民统治，是激发殖民地内部的各种复杂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陈映真以艺术家的笔墨，表现的却是思想家的洞察力。他写出了沦为罗马帝国殖民地的犹太地区的不同阶层的观念，从不同的“观念”形态去表现不同阶级的生活状态；帝国主义者、犹太的上层阶级、法利赛人、食利者、激进主义的奋锐党人、主张社会革命的世界主义者、普通民众等。战后台湾还没有哪一部小说，以貌似异国的历史故事来如此深刻地表现战后东亚地区的复杂的社会现实和思想状况。经历了两次政党轮替的台湾读者，读到48年前陈映真的这篇作品，应当会对陈映真小说的预见能力，感到惊讶吧？

同样，经历过战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又因为“文革”的错误而从中吸取到经验教训的大陆读者，也都会思考在一个以社会主义为理想的国家建立之后，何以会出现毁灭性的挫折的问题。陈映真在80年代的小说《山路》（1983）、《赵南栋》（1987）中，都有过深切的反省。到了晚年，63岁的陈映真在散文《父亲》（2000）中又重提这个话题，而他的反省，则通过“罪性”这样一个具有基督教神学色彩的概念，为建立“人”与“制度”的相互关系，在法律、政治、经济、文化之外，多了一个新的角度。他写道：

我们谈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当过穷人家的苦孩子具有三十年代左翼知识的父亲，对于社会主义有不止乎口耳之学的理解。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他有深的同情，也有一份期许。但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看着当时文革的骚乱，他有很深的宗教的忧虑。父亲说，他皈向基督以后，才认识了人原有的罪性。而这人的罪性如果没有解决，终究会朽坏了人出于最善良愿望的解放和正义的运动。父亲曾几次表达了他对于日本、“无教会主义”杰出的基督徒学者矢内原雄雄的崇敬。父亲说，为避免体制化教会必有的软弱和败坏，矢内原寻求没有教会组织和职司体系的、个人得以直接借由读经、思想和祈祷与上帝交往的信仰。但在学问上，矢内原却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矢内原科学地揭发了日本在台湾的糖业帝国主义掠夺体制的秘密，给予台湾反帝抗日运动很大的启发和激励。但作为一个忠心的基督徒，在日本军国主义最猖狂的四〇年代，